

陈独秀第一次来武汉

张 影 辉

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突出代表之一的陈独秀,和武汉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他曾多次来汉工作过,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次来汉的情况,而对他在这一以前来武汉的情况就不甚了解了。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就来过武汉。在武汉,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联络进步人士,特别是和工人交朋友,进行工厂调查,对于湖北和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湖北共产主义第一个支部的成立,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些介绍,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陈独秀第一次来到武汉是在一九二〇年初。他是应武昌文华大学的邀请,来汉讲学的。

武汉的群众对陈独秀是十分熟悉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向禁锢中国社会前进的封建思想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这一切对当时的思想界和寻求真理的青年是有很大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的。当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①一九一九年九月毛泽东也曾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恽代英,还在中华大学学习时,就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九一七年恽代英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在中华大学组织图书贩卖部,代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一九一九年初恽代英在武汉组织进步社团“新声社”,并把他们出版的刊物《新声》寄给《新青年》,请予指导。一九一九年三月“新声社”在给《新青年》的信中赞扬说:“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同时,湖北和武汉的一些进步青年争读《新青年》,进步的教师还选教《新青年》的文章给学生阅读和欣赏。因此陈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初,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阶段来武汉,对于武汉的思想界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连当时被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思想禁锢较深的教会学校也以聆听陈独秀的名言论为荣。因此,一九二〇年初武汉的教会学校文华大学邀请陈独秀到武汉讲学,并“磋商改良教授国文的办法,将推行于全国各教会学堂”。^②

在文华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汉讲学的同时,广州也曾邀请陈独秀去商量办理学校的问题。但是陈独秀却舍广州而从上海先来武汉,这也说明陈独秀对武汉的关切。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陈独秀从上海乘大通轮船出发,四号下午抵汉,由文华大学干事部派人过江欢迎,落榻文华。原来学校准备带乐队前往奏乐欢迎,因为当天下雪未果。^③

陈到武汉后作了多次演讲,并广泛地接触了教育、文化、新闻等各阶层的人士,在许多问题上同他们交换了意见,进行了讨论。五日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由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

生协进会主持的千余人的大会上作了题为“社会改进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④六号的上午又在文华第四讲演堂举行的文华学生毕业典礼会上作了以“知识教育与感性教育问题”^⑤为内容的发言。七号上午九时陈独秀在武昌高师作“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同日，陈还和来访的五位议员讨论了教育的问题。在这些活动中陈独秀宣传了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改革社会问题。

陈独秀到武汉后，第一次演讲就是《社会改造的办法与信仰》问题。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有三个打破：（一）“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阶级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用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享有田地权利”。从这些观点来看，陈独秀并没有提出要推翻旧制度的问题，而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废除旧中国的私有制，主张实行平民的社会主义。联系他以前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已较前大进了一步。譬如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就谈到了“社会主义”，但是当时他并不懂得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写的不少文章中都反映了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打破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肯定态度。如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在《廿世纪俄罗斯的革命》^⑥一文中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反映了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从不懂、同情到肯定的一大进步。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宣言》，强调民主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又有了一些进步。联系以上材料来看，陈独秀在武汉所讲的“三个打破”更是肯定了中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

接着，陈独秀在报告中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改革社会还需要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他说：“要知辛亥革命是速成的，我研究的，所以易于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就是无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勉强挂个共和的招牌，”“所以我们再欲第二次革命，若不将方法与信仰的心理贯彻到极点，是不能胡乱奋斗的。要乱闹就是蹈辛亥革命的覆辙。”并且指出：这一次革命我们面对的“恶魔必比前更加剧。”因此陈独秀向决心改造社会的人大声疾呼，要加紧的“预备方法与信仰。”

但是，陈独秀所说的信仰就是“（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主张“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革命与劳动的平等。”至于怎样准备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呢？陈独秀却认为“有社会改造决心的人，要竭力互助，要以身作则，那就在预备方法与信仰了。”^⑦陈独秀关于革命的信仰和方法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那套自由、平等、博爱的框框，并想用宣传教育的方法使人人受教育、人人参加劳动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同时他在讲演中还反映了一种对阶级斗争惧怕的心理，譬如他说：“这种革命无需乎要流血，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但是时机未到，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心不成熟，是不能胡乱暴动的。”

二、宣传了新教育，批判了旧教育。

二月七日上午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作题为“新教育精神”的演讲时，首先提出了教育有新旧之分。他说：“教育就是教育，怎样会有新旧之分呢？怎样算是新教育呢？怎样算是旧教育呢？”“我晓得大家必定说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这些科目要算是新教育；读经史、读四书、读古文、学美术要算是旧教育了。”陈独秀并不以为然，他说：“无论什么教育，要研究他的时候，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并不在科目的新。就是研究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旧教育，只

要他方法新、精神新，还是有用的。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精神不新，还是白说的。”

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陈独秀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教育要趋重社会。”就是说“社会离不开教育，否则人类的知识定不能发展。”“同样的教育内容不能脱离社会，如研究经济学的不晓得详察现在社会的状况和财政的虚实，就是多读些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学又怎么样呢？那于社会是一点益处没有的。”（二）“要注意启发的教育”。他反对教师“不问能不能供学生的研究合理否，只要将他所晓得的都说与学生，那就算得是尽职了。”这样的后果必然“总是教员将所晓得的都说与学生，学生晓得了又是这样的教育他将来的学生，这个文化思想力怎么会发展呢？”因此陈独秀主张启发式的教育，培养训练启发学生的想像力。在教授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进行。他举例说：如地理教育“并不在一刻就要晓得外国、中国的地名要塞，就算晓得地理，那是无用的。要教学生晓得现在住的地方有多大，出产有几多，再由城而省，由省而及全国，由本国而及外国，那天下的地理就自然明瞭了”；（三）“要讲究实际的运用不在形式”。陈独秀说：“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每讲究形式的好看，不讲究内理结不结实。”他批评当时的当权者说：“你看在教育部办事的人，几多是晓得各地的情形和经济状况的呢？他只要就他们几个人所想的，要各省的学校都来照他的整齐划一。所以，各地学校要兴的弄得不能兴，要废的弄得不能废，都是为他们限制了。”陈独秀认为当时的教育效果是“现在的农业学生赶不上老农夫，商业学生还有赶不到老朝奉的。这是么原故呢？都是讲究外表不讲实际应用的病。”“我很希望后来办教育的人不要讲究形式，有几多钱办几大的学堂。科目不在多，只在其能不能适用。教员不在多，只在其有没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新教育造就新人材矣。”⑥

教育是上层建筑，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改变而发展变化的。陈独秀的演讲虽然没有认识到经济制度的改革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来宣扬“教育救国”“教育万能”，而是强调新的教育和教育的方法必须联系社会实际，注意实际的应用问题。陈独秀的这些意见，对于今日的教育来说也还是大有裨益的。

七号下午，武汉学界周春煦、李慕祺、吴国干等在给陈饯行的宴会上，陈独秀还谈到文字改革问题，他主张普遍实行注音字母的改革。

陈独秀在武汉这一段时间中，除了和知识界、宗教界、政界等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外，他的另一个较为重要的活动是和工人及进步青年交朋友。特别是对武汉工人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陈独秀当时住在文华大学，结识了该校的工友郑凯卿。他多次和郑谈话，向郑凯卿灌输革命的新思想，影响郑凯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独秀还向郑了解武汉工人状况，并且通过郑的关系和介绍还接触了纱厂的工人，了解武汉纺纱局工人工作及生活等情况。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和研究，陈独秀在离开武汉时曾给郑凯卿留下一个详细的调查提纲，调查武汉工厂的分布、工人数目和工人生活等状况，请郑帮助调查后填写。⑦郑凯卿和包惠僧一起协助陈独秀对武汉工人状况的调查，经过他们多次通讯、反复研究编辑后，以文华大学学生的名义把这个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题目为“武昌五局工人状况”。文章对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所属工人的工种、工时、工资等情况作了较详细的纪录。

陈独秀在武汉还会见了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成员，陈独秀回京后把考茨基的书寄给恽代英。恽又接受《新青年》社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此书被列为新青年丛书之一，由新青年社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以单行本出版。陈独秀给武汉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利

学术动态

中国古代文论讨论会

探讨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艺术规律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武汉大学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科研、刊物、出版等一百个单位共一百六十多名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树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明确目标,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会议根据周扬同志的提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和其他艺术规律问题。

与会者认识到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所受干扰极为严重,有的把理论研究搞成了文艺政策的说明,有的则利用古代

文艺理论遗产作牵强的比附,特别是对自己民族的文艺理论体系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建立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文艺,而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远远不能适应新文艺的发展。因此,当前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意义是很大的,也是古代文论工作者的长远努力目标。

关于古代文论中现实主义问题:

有的与会者提出,我们在研究现实主义问题时,忽视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那段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述是不对的,然而,把这段话作教条主义的理解,甚至作为普遍的现实主义定义也是不行的。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言论,是以小说为对

群书社的成员,于六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到当年陈独秀身着灰色长袍、戴着围巾、妙语如珠、侃侃而谈的情景。当时的记者包惠僧曾多次访问过陈独秀。包惠僧说:“我和陈独秀一见如故,多次交谈并和他讨论社会问题。”陈独秀离汉后,包惠僧和工人郑凯卿同陈独秀经常通信联系,以后湖北成立第一个中共支部时,由于陈独秀的推荐,包惠僧和郑凯卿都成为这个支部的第一批成员。郑凯卿还是这个支部成立初期唯一工人成分的成员。包惠僧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底回忆当年陈独秀离开武汉后他们的通讯时说:“我保留着他的信,可惜在十年浩劫中都烧了。”

武汉各界人士对陈独秀的演讲十分拥护和欢迎,使湖北的军阀大为震惊,急急忙忙下令停止其活动,迫其及早离汉。陈独秀被迫提前于二月七日晚离汉乘车北上。行前陈独秀还出席了汉口下段保安会的欢送会。

陈独秀第一次来武汉,从二月四日至二月七日共四天,时间虽然不长,却是繁忙的四天,是生气勃勃的四天。陈独秀这次来武汉,对武汉地区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他思想的转变,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新青年》2卷6号。

②③④⑤ 《时事新报》1920年2月2日。

⑥ 《每周评论》第16号。

⑦⑧ 《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2月9日。

⑨ 包惠僧于1979年2月底的回忆。